



1931年7月5日,国民政府行政院通令财政部,拨款一百二十一万元,用来扩充中央无线电台。这个消息,以《中央扩充无线电台 大电台开幕前尚须一百二十一万元,国府会议通过由行政院令财部照拨》为题,出现在7月6日的国民政府《中央日报》上。文章的大意是说,因无线电宣传颇为重要,原有电台功率已有局限,为了扩充无线电传播区域,更好地进行宣传,需要扩充无线电台,然而这个举措将耗资巨大,因此希望财政部能够顺利拨款。

1931年,正是国民政府全面开展建设的时候,各个“衙门”都在要钱,财政部已收紧拨款,在这种情况下,无线电台扩充能顺利地讨到经费吗?文章简明扼要地说,“经国府第一次会议,决议照办。”由此可见,无线电台作为宣传工具,得到了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。那么,这则消息的出台有何背景呢?

□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张荣

# 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扩容幕后

## 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广播电台,主要播送“消费指导”

“这则消息中的‘无线电台’,重点指的就是无线广播电台。”江西省电子信息工程学校的姜连煌(音)老师告诉记者,1931年的时候,国民政府的中央广播电台已经建立近四年了,但在国民政府的中央广播电台建成之前,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广播电台。

据介绍,1918年,德国创建世界上第一个无线广播电台,五年之后,即1923年,中国无线电公司经理、美国人奥斯邦便在上海广东路3号大来洋行屋顶创办了中国第一座广播电台。这个电台每晚8点至9点播音1小时,内容有新闻、音乐、演说等。开播第三天,电台就

播出了孙中山的《和平统一宣言》。但这个电台只维持了3个月。

而随后在1927年出现的由中国人自己开办的第一家广播电台,则充满了商业的味道。

“提到这家民营的广播电台,就必须提到上海的新新公司。”姜老师说,新新公司的老板是侨商刘锡基。他原本是大公司先施公司经理,因对公司利润分配不满,脱离公司后筹集资金300万元,选择毗邻老公司的哈同洋行房地产地皮,盖一座中型百货公司。

1927年元月,新新公司开业。为了吸引顾客,新新公司突发奇思妙想,开设了一家广播电台,主要

广播京剧、滩簧、申曲、滑稽戏、文明戏等节目,还播送时事新闻。这个被称为“玻璃电台”的新玩意设在新新公司的六楼,电台四周都是玻璃墙,来这里的顾客可以一边购物,一边观看播音和演出的情形。

这个电台还日夜不停地为新新公司及其商品大做广告,很像今天的“消费指导”。喜欢新奇的上海人一传十,十传百,纷纷相邀前来光顾。新新公司的生意逐渐兴隆起来,在南京路站住了脚。

“而国民政府建立的广播电台,目的则直指政治宣传,并且这个电台的建立,可谓一波三折。”



1932年,这里成为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的新台址 快报记者 施向辉 摄

## 其他广播电台节目内容被严格限制

1932年11月中旬的一天,江门外北河口的新台址举行开播典礼,这里新出现了一座75千瓦的强力广播电台。而这一天,南京的一些公园特辟出小广场,将收音机置于草坪上,放大音量,让市民收听。“这其中有些事情值得一提,据说,当时向德国一家公司订购中央电台广播机的功率为50千瓦,可后来却变成了75千瓦,且是原价格。原因是这家公司原打算给陈果夫回扣费被拒绝了,于是他们主动地加了25千瓦。”

功率增加后,中央无线广播电台在海内外都可以收听,这使日本大为震惊,因为当时日本全国仅有1万瓦特的电台5座,其电台功率总和还赶不上我国一座。“与此同时,延安也能清楚地收听到。”

“然而,有一点让陈果夫没有想到,就是各种公营、民营电台随后越来越多。1934年,仅上海一地就有电台54座。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,电台之间相互干扰很普遍。”姜老师分析说,这实际上非常不利于广播事业的发展。但国民党的主要精力不是放在科学控制地方电台,而是在审查广播节目内容上。他们规定,各地电台,自1936年2月20日起,除星期日外,每天从晚上8时起至9时05分,必须一律转播中央广播电台节目。1936年10月28日,又规定,凡是属于宣传、教育、演讲的内容,公营电台应该占多数,民营电台也不能少于40%。更为具体和严密的是,各电台必须把制定的每期节目表送交审查,每天播送节目的标题和担任者姓名,也要提前编造报表,等待审查。

## 陈果夫筹建广州电台,因经济拮据停止

“说起国民政府的广播电台,就必须提到陈果夫。”姜老师介绍说,1924年左右,在上海的陈果夫无意间听到了广播里的新闻,敏锐地察觉到广播作为政治宣传工具的价值。在当时的条件下,识字的人很少,报刊的宣传效果不能与广播比。他立即产生了为广东革命政府设立广播电台的念头。可是,当他向上海的无线电专家发出邀请时,却因广东的形势不稳而遭拒绝了。不久,陈果夫到了广州并担任要职,他与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商量此事,张也很感兴趣,于是,陈果夫开始筹划在广州建立电台的事。

“就在这个时候,一个重要人

物出现了,他就是李范一。李在美国专攻无线电,并在美国无线电制造厂工作十多年。”陈果夫得知李范一回国后,就电邀他到广州来。

李范一认为,要在广州建立一个广播电台,至少需大洋4万元。张静江商请当时的财政部长宋子文拨款,宋子文怕该款拨出后被挪作他用,迟迟不批。张静江于是就直接请宋将款拨给陈果夫保管。陈果夫领到钱后,交待人到上海去采办机器。不料,到了上海才发现,必须要15万块左右的大洋才能买来机器。这无疑是个天文数字。因此,在广州设广播电台的事不得不停顿下来。

## 功臣李范一性格耿直,不满舞弊辞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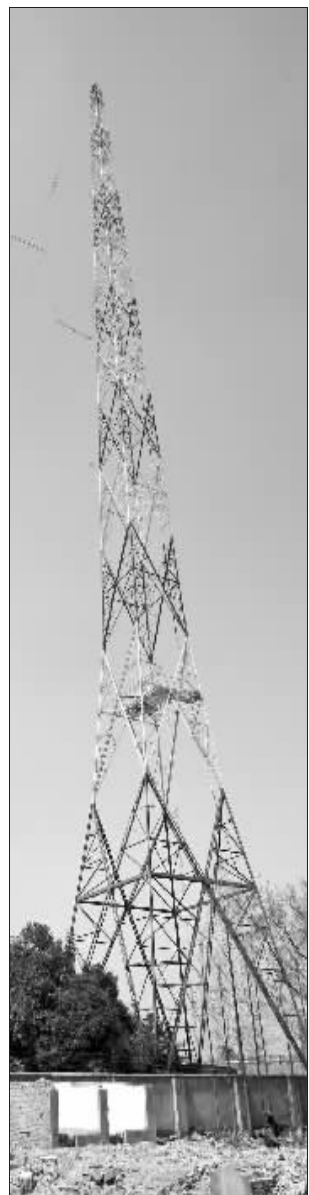
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,李范一主张设立无线电制造厂。陈果夫于是将办广播电台剩下的三万五千元交给了他,李范一说不够用。陈果夫便请蒋介石下手令发给十万元。蒋介石再三解释无款可拨。陈果夫却说:“只要一上手令就好办。”蒋介石于是下令发洋十万元。尽管钱无处可领,但李范一这位在美国先攻读经济后攻读无线电的专家,立即用蒋的手令筹来了一些款子。到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时,他共造出无线电机十三部。

1928年春,李范一向陈果夫报告说,上海有一架500瓦广播机待卖。此时国民党内部正在内讧,蒋介石也尚未复职。为了使国民党自己的广播电台开机,陈果夫设法借七千两银子,把广播机订了下来。此后,陈果夫陆续设法垫款1.9万两,订购了500瓦的中波播音机全套。在陈果夫的主持下,1928年5月,勘定了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后院西南角的一块空地,建造了机房,装置号铁塔。8月1日下午,广

播电台在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落成及开播典礼,并正式命名为中央广播电台。

“建立广播电台的功臣李范一,1930年被任命为交通部电政司长。但他不久就辞职了。”姜老师说,因购买电机等设备,李范一与交通部负责人发生很大的矛盾。他去上海签订合同时,发现文件上机器规格和数量,本身价值与付款数字不符,吃亏数万元,他愤然地说:“虚报数万元,成什么话,我决不同流合污,决不签字。我不签字,他们就买不成!”随即飞回南京,坚决辞职不干。

国民政府的中央广播电台虽然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电台,但电力有限,电波覆盖范围较小,甚至仅南京一市,就存在城东和城南收听效果不一样的局面。如果不从各方面扩充中央电台,势必会影响其发展。于是,1931年7月5日,国府会议通过由行政院令财部照拨一百二十一万元,用来扩充中央无线电台。



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的发射塔如今依旧矗立在江东北路上 快报记者 施向辉 摄

## “南京之莺”因眼疾离开播音岗位



刘俊英在播音中 资料图片

“对于老南京来说,怎么会不知道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台呢。”87岁的老南京魏全德告诉记者,年幼的时候,他是一个地道的广播迷,因为家住下关,收音机的信号特别好。“我印象最深的,是1929年孙中山奉安大典前那一系列的报道,那时我虽然刚刚七八岁,可记得清啊。广播里说,为了奉安大典,市民不能光着上身。所以,那个夏天,我第一次穿上了小背心。但是,我那些住在中华门一带的伙伴就说,他们那里听得太不清楚,经常有‘刺啦刺啦’的刺耳声。我还记得,有一年南京的霍乱特别厉害,广播里就整天在播,告诉市民不要生喝井水,不要买路边的荷兰水。还有,西安事变后的第二天,广播就在大骂张学良,我们反应不过来,

后来才知道他把蒋介石给扣了。”至于其他的广播电台,“不听,因为没有频道能有中央电台清楚,你看那塔,一百二十多米高,有几家能有?”魏全德用手指着不远处那高耸的发射铁塔说。

而让魏全德印象最深的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员,便是有着“南京之莺”美誉的刘俊英。

“刘俊英刚来播音的时候,我十岁,刚刚吃了长寿面。听说她来自北平。当时,是南京这边派人去北平招收女播音员的,报名的人特别多。”据魏全德回忆,他曾经听人说过,那考试场面十分壮观,有二三千名考生将考场挤得水泄不通。而当时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攻读教育学的25岁大学生刘俊英表现十分突出,最终脱颖而出,成为播音小姐。

来到南京后,刘俊英除播报新闻、专题外,还主持儿童节目,“不但小孩子喜欢,大人也喜欢。”刘俊英在东南亚甚至日本都很受欢迎。日本也专门有人来南京采访她,称她为“南京之莺”。“但是抗日战争爆发后,我就再也没有听到她的声音了。听说是因为她的眼睛出现了问题,看不清稿子,不得不离开播音的岗位。”